

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 宁 骚 主编

〔阿根廷〕 吉列尔莫·奥唐奈 著

王 欢 申明民 译

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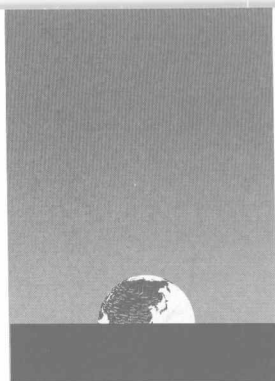
Guillermo A. O' Donnell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 宁 骚 主编



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

〔阿根廷〕 吉列尔莫·奥唐奈 著

王 欢 申明民 译

D777.021

A1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8-276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阿根廷)吉列尔莫·奥唐奈
(Guillermo A. O'Donnell)著；王欢，申明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
(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

ISBN 978-7-301-13728-4

I. 现… II. ①吉… ②王… ③申… III. 官僚主义—政治制度—研究—
南美洲 IV. D777.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9872 号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y Guillermo A. O'Donnell

© 1973, 1979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

著作责任者：〔阿根廷〕吉列尔莫·奥唐奈 著 王 欢 申明民 译

责任编辑：都 娟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3728-4/D·2047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ss@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121

印 刷 者：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3.5 印张 194 千字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译丛总序

宁 | 骚

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当这种方法被系统地用来认识政治现象时,就形成了政治的比较研究;当比较的对象是各自独立的政治体系时,这种政治的比较研究就成为比较政治学。亚里士多德首创作为一门经验科学的政治学,而他获取和分析经验材料的基本方法就是比较,这样他就同时创建了比较政治学。自19世纪中期起,经验研究和比较分析推动着政治学从思辨的哲学变成实证的科学。到19世纪末,政治科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而比较政治学则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

比较政治学有三个核心要素:第一,比较方法必须贯穿该学科领域的任何一项课题的研究工作中。这一方法要求在同一研究中观察和分析的对象须是不少于两个并互为参照系的个体或群体,比较的直接目的是辨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比较始于对事物外部特征的描述,进而对其异同做出分析和解释。任何事物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但是要使比较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比较分析必须选择和使用一定的理论工具。因此,比较的方法不是排他的,而是可以容纳其他理论方法和技术方法的一种方法。第二,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国家,至少应当是独立的政治体系,所以现时代的比较政治学可以简括地界定为“对民族国家的比较”。只有跨国的政治比较研究才属于比较政治学,明确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除此之外就难以划定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边界。但是,以民族国家为比较分析的单位,并不意味着仅仅把国家和政府作为直接观察的对象。事实上,被置于一定的民族国家的总体框架与情景中的任何政府和非政府单位,无论群体、组织还是个人,尽收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之内。第三,比较政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和经验出

发,进行实证研究或经验分析,从中引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性,通过描述、解释和预测来认识政治现象,是这门学科的基本特征或另一核心要素。对比较政治学来说,真理是具体的。一切既有的概念、命题、模型和理论的真实性,都有待于经验和事实的进一步验证,都以各个事物发生与沿革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换言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自19世纪中期以来,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有一条主线,这就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和技术手段,才能更有效地使政治的跨国比较研究成为一门科学。比较政治学的这种科学诉求或科学化努力,迄今已经经历一系列重大的范式变迁。在19世纪,历史主义是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这一名言成了比较政治学者的共同信条。人们把科学的方法理解为“历史—比较”的方法。进入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期,制度主义成为这门学科的主流范式。人们相信,在宪政民主制已经巩固的条件下,由现行法律体系确立的一系列正式制度规范,制约和决定着各种政治主体的实践活动;而现行法律体系是人们在关于国家与法的政治理念指导下构建起来的。政治哲学—法律体系—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成为比较政治研究跨国分析的典范思路。因此,这种制度研究法又被叫做法律—制度主义。同时,这一主流范式并不排斥或贬抑历史主义;相反,在获取和处理实证材料的基本方式上,以及在对制度变迁和制度规范作用于政治实践的过程与结果的研究上,它必须借助于历史主义。20世纪50—60年代,行为主义取代法律—制度主义和历史主义,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行为主义是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引进的一种方法论,它与刚刚兴起的电子计算机和社会统计学的应用相结合,使比较政治学在获取和处理实证资料的基本方式上发生了巨大变革,不仅破天荒地第一次将这门学科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全球的范围,而且使这门学科朝着科学化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此,比较政治学不再仅仅是静态、描述的,而是动态、解释性和预测性的,理论的建构与验证成为研究的动力和目标。60年代末,比较政治学开始转入后行为主义时期。后行为主义不是一种研究范式,而是多种范式的并立和竞争,影响较大的先是依附论、世界体系论范式,接着是组合主义或法团主义范式,现在是新制度主义范式。

新制度主义被区分为三种既有联系而又有显著区别的分析路径:理性选

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由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一个演绎的逻辑体系,社会学制度主义不能清晰地区分文化与制度,因此只有历史制度主义对比较政治学这门经验科学来说,才具有广阔的适用前景。历史制度主义倾向于在相对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的相互关系。它把制度看作是一定的历史情景的产物,而制度塑造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并且影响着行为者的整个行动过程及其对工具性行为的选择。它认为个体是深深地嵌入制度网络之中的,个体偏离制度会使其境况变得更坏;制度对于解决集体行为困境的贡献越大,它就会越有活力。它将焦点集中在展示一定的政治现实中多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作用,通过将结构化要素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揭示制度是如何构建这些互动关系并藉以影响政治结果的。历史制度主义提供的新视角,可使比较政治学更加有效地去解释当今世界各国内部政策的延续性和不同国家间政策的变异性。

历史制度主义对制度和历史情境之间关系的解释陷入了循环解释的困境,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指明了走出困境的方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历史研究法是一切实证科学的唯一方法,这种观察方法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现实生活发展过程中的人。他们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而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所以对一定的人进行的经验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同时明确地认识到影响这个过程的还有其他各种非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也认识到各个人都有其自己的、方向各异的“自觉期望的目的”并对外部世界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所有这些就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导致了一定的历史情景的形成。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揭示出了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的更深层次的动因,从而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更有解释力的一种方法论。

比较政治学的每一种主流范式都有众多的学者遵循,并产生了大批的研究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归类,我们可以把比较政治学划分成这样几种基本的研究领域:(一)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学辨识不同

民族国家或政治体系的各种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模式的异同并解释导致异同的原因,用统一的概念体系来认识和表述这些复杂的因果关系,进而抽象为理论。这样的理论在经验层面可证伪,从而确定其解释力的强弱和范围。比较政治学的理论积累是极其丰富的。自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起直到现在,政治科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大多出现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对比较政治学来说,任何既有的理论的真理理性都有待于新的事实和经验的检验,因此被积累起来的理论成为新的研究项目的理论假设的来源和分析框架,从而具有方法的功能。由此可见,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是统一的。(二)比较政治制度。在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以前,比较政治学就是比较政府或比较政治制度。自比较政治学诞生以来,政治体制始终是这门学科研究的中心议题,而政治体制是由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原则、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统治者和管理者的行为准则等一系列政治制度构成的整体。政治制度凝聚了所有种类的权力,约束着体制内外各种人的行为。观察和比较本国与外国的政治制度,是认识和理解人们的政治行为的最方便视角。因此,尽管曾受到行为主义范式的有力冲击,比较政治制度仍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研究领域被保留了下来。(三)比较政治行为。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可区分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两类。比较政治制度只观察和比较制度性行为,非制度性行为不在其视野之内;而比较政治行为则对二者都进行研究,并注重观察和比较非制度行为——既包括体制内各种政治角色的非制度行为,如腐败、贿选、幕后交易、营造和维护非制度性社会关系网络等,也包括体制外各种政治角色,如政党、利益集团、社会团体、大众传媒、辅助决策机构(智囊团)、企业界和学术界精英以及宗教、族群、社会阶级与阶层等的政治行为。对比较政治学来说,比较政治行为极大地拓展了它的研究视野,增强了它的理论构建能力,推动着它生发出政治社会学、政治传播学、民族政治学等一系列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从而使之真正地担负起了政治学科学化的重任。(四)国别政治与地区政治。比较政治分析是建立在国别政治研究和地区政治研究的基础上的。没有系统的、深入的国别政治研究和地区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分析就失去了实证的基础。比较政治学到现在已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这门学科的所有主流范式都得到了引进并被应用于研究工作中,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

我国的比较政治学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法律—制度主义从这门学科被引进时开始，长期处于主流范式的地位，至今仍在政府颁布的高等院校专业分类目录中有显著的体现。第二，没有经历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的阶段，科学化不曾成为这门学科的强烈诉求：获取实证资料的基本方式始终是汇集既有文献记录而不是社会调查，量化分析的研究成果极其罕见。第三，在从事比较政治分析的学者中，很少有人做过或同时在做国别政治或地区政治的研究；而在从事国别政治或地区政治研究的学者中，也很少有人真正地关注比较政治学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取得的进展。也就是说，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尚不能够正确地处理特殊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理论与经验的关系。

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向世界，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从全球比较的视野来观照自己的国家，比较政治学将适应这一需要开创学科发展的新时代。为推动我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和教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有选择地评介国外的学术成果是十分必要而且必需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体察到这一情势，筹划、组译并将出版《比较政府与政治译丛》，这套丛书收入的著作侧重于可以辅助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学甚至直接可用作教材的作品，具有入门引导性质，但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能够相当系统、全面地勾勒和凸显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对象、议题和方法，介绍和反映在这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理论构建和积累起来的知识体系，我相信，这套丛书会使有志于学习和研究比较政治学的读者受益良多。

2004年4月12日

译者前言

这本书是阿根廷籍著名政治学家奥唐奈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奥唐奈1957年毕业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法律专业,后到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政治学,1971年获硕士学位,1982年获博士学位。他曾执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等学校,现为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政治学和国际研究 Helen Kellogg 讲座教授,同时在阿根廷和巴西数个研究机构担任负责人或高级研究员。他曾担任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副主席、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主席,1995年当选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奥唐奈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威权主义、民主理论和民主化、拉美政治与社会,主要著作除了《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之外,还包括:《民主巩固中的问题:比较视角下的南美新民主政体》(*Issues in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The New South American Democra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92)、《拉美的贫穷与不平等》(*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1998)、《另一种观点:威权主义和民主化文选》(*Counterpoints, Selected Essays on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1999)、《民主的质量:理论与实践》(*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Theory and Practice*)(2004),他与施米特(Philippe Schmitter)和怀特黑德(Laurence Whitehead)合编的四卷本《从威权主义统治转型》(*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1986)是一部非常有影响的民主化研究著作。

《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是一部在比较政治学中具有范式意义的著作。20世纪60年代中期,军队在拉美最大的两个国家巴西和阿根廷通过军事政变控制了政权。这一事件对二战以后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关于更高级的工业化导致民主出现的假设构成了有力挑战,它很快产生了最早的一批在拉美背景

下反思工业化—经济增长与民主化之间关系的文献,《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这些著作形成了一种与此前的现代化理论不同的假设:在后发展中国家,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可能与民主的崩溃同时发生。这就使有关政治发展的理论范式突破了此前的简单而乐观的线性思维,开始认真考虑社会经济现代化与以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发展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奥唐奈在这部著作中最早提出的“官僚威权主义”概念后来得到了广泛的继承和发挥,成为比较政治学中一个极有诱惑力的概念。在属于这类体制的国家,军队作为一个机构进行统治,而不是像传统的军事独裁那样由一些军队统治者个人排他性地进行统治。此外,军队在政策制定中更多地采用了一种技术官僚式的方法,而不是“政治的”方法,即政策由不同社会群体通过选举、议会、政党、工会等渠道表达的经济和政治需求塑造。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奥唐奈等人在“威权主义”之前加上了“官僚性的”,称之为“官僚威权主义”(参阅大卫·科利尔编《拉美的新威权主义》一书的导言,这本出版于1979年的论文集代表了对官僚威权主义理论的早期评论,建议感兴趣的读者阅读)。这个概念甚至被用来指称一种独立类型的国家政治体制,但是,严格来讲,关于它是否具有超越拉美政治环境的一般意义,即一个不属于拉美世界的国家,比如韩国、泰国,在经济社会现代化中出现的非民主政体是否可被界定为“官僚威权主义”,是一个值得仔细思考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对于思考任何现代化背景下的非民主政治问题,官僚威权主义理论的启发意义都是不容置疑的。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官僚威权主义理论的内涵及其意义,我们翻译了奥唐奈写于1979年的《官僚威权主义国家中的紧张状态与民主问题》一文,作为附录。

王欢 申明民

2006年7月

序 言

这本书写于我在耶鲁大学读政治科学研究生的时候。1971年5月,我返回了阿根廷,当时由于有其他事情要做,我在交付出版之前,只能对手稿做非常小的修改。因此,我并没有将1972年已发生的重要的相关事件融合进我的分析,也没有用我对其他作者的几个颇有价值的贡献——它们引起我的注意太迟了——的检验结果来丰富它。然而,我觉得,把这个文本依其现状呈现给读者来评判,并没有什么不合适。它的基本论点并未因过去一年所发生的若干事件而失效;毋宁说,这些事件似乎与本研究所以认识到的总趋势十分吻合。

形成本书最初想法的主要考虑因素是这样一个显著事实——婉转言之,即,南美国家在最近几十年中所经历的多重变化似乎并未提高更开放的政治体制出现和巩固的可能性,也未提高可有效减小这些社会中显著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这一观察与那些仍广泛流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维度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念十分矛盾。根据这些观念——它们将在正文中得到详细讨论,体现于某些社会经济指标中的“进步”必将反映正在导向更有效政治安排的变迁过程。与此相反,正是在南美各国——这些国家在过去20年内现代化进行得最为深入——唯一成功的尝试是植入了一种新的威权政治体制,我称其为“官僚威权主义”。

为了使读者能够评判这一命题及一些更重要的含义,几个预备性的步骤是必需的。首先,关于“现代化”这一术语在何种意义上被使用,必须得以讨论。这需要使与政治学和社会学主流之间的一些重要分歧明朗化——这是一场我担心对许多读者来说将会十分沉闷无趣的讨论。第二个要求是展示出支持以下观点的分析和数据,即,官僚威权主义是一种只存在于相对较高的现代化情形中的政治现象。一个直接相联的观点是,在“官僚性的”威权主义和被多数文献

描述为南美大陆之典型的其他类型(我称之为“平民主义的”和“传统的”)之间,具有至关重要的区别。对官僚威权主义具体性质的描绘,通过置之于比较视角,并表明它与非拉美的其他高度现代化情形中体制的类似性而得以实现。

在界定“现代化”概念以及提供“官僚威权主义”的类型学特征的预备性步骤完成之后,就可以探讨高度现代化——它似乎是促成创设和巩固官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最有影响的因素——的要素和过程了。正是关于该历史过程的这一动态的、具有时限性的部分,缺乏最重要的分析性贡献:解释新政治形式的出现及其对社会环境的影响。然而,该研究的几个局限性(缺乏充足数据是其中之一)使得不可能提供这样一个分析。能够实现的最多是使分析方式显得合理且开放,以用未来的经验工作来检验如下假设——用韦伯的话来说,即,在当代南美高度现代化的情形和官僚威权主义之间存在显著的“选择性亲和关系”(elective affinity)。

因此,本研究只是一项初步的探索,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或未来将要做的其他研究的出发点。按我的考虑,它需要完成清理概念根基并提出社会-经济与政治维度之间特定的重要一致性关系的工作。如果不完成这一初步的步骤,就不可能建立起对这些一致性关系的严格解释,不可能详细考察它们之间历时的交互作用,不可能就新政治体制的演化做出可靠的预测,不可能使诸单位(国家)之间的区别——以前的高层次的总量分析将这些区别归类于同一类“箱”中——进一步精确。

在此再做两点说明是适当的。第一,在可能的范围内,在我的分析的静态部分,我更倾向于使用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早期的数据,因为这一阶段刚好处于创建官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它是本研究主要集中考察的对象——的尝试之前。第二,本研究的经验参照是南美洲国家的范围。中美洲国家被排除在外是因为,除了地理上的连续性和模糊界定的共同文化(二者都有拙劣绘制的政治后果)以外,似乎没有强有力的理由将所有拉美国家包括进同一语境。毋宁说,在所知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在一个选定的分析层次上,将经验参照物划定到其相关的共同背景性特征能被明确界定的单位上,那么似乎所得甚丰。出于本研究的目的,这里划定在南美国家的范围。^①

吉列尔莫·奥唐奈

① 然而,为了忠于其他作者的概念,我将在提到使用“拉美(的)”这一术语的著作时使用该术语。

致 谢

我有幸在耶鲁大学政治科学系度过了三年(1968—1971),它从许多方面给我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最有帮助和最适合的环境。那里的几位学者给我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极大地提升了本研究。特别是 William Ascher, Natalio Botana, Ronald Brunner, Robert Dahl, John Fitch, Carlos Floria, Alfred Stepan 以及 Joseph Tulchin,他们十分慷慨地付出他们的时间和耐心,对整个草稿的前几稿提出了极其详细的批评意见。我也享有与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其人其作保持十分密切联系的特殊优待,他在本研究的所有阶段都提出建议、批评、激励和鼓励,这令我至为感激,难以为谢。Paul Gilchrist 用只有他的耐心才可匹配的才智,承担了编辑我的西班牙式英语的繁重任务。我在政治科学领域研究的起初阶段得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支持。这本专著是丹佛斯基金会(Danforth Foundation)慷慨资助的一项正在进行中的研究的早期结果。然而,这些个人和机构都不应对他们的支持或批评的后果而承担责任。

目 录

译者前言	(1)
序言	(3)
致谢	(5)
第一章 假设与分类	(1)
最近的研究	(1)
拉美研究：分级与分类	(7)
数据与均值	(13)
定义与指标	(22)
实际值的近似值	(27)
第二章 南美政治的替代性概念化	(41)
阿根廷与巴西：从包容到排除	(43)
当代南美的官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	(70)
阿根廷和巴西官僚威权主义体制的运作	(75)
附录：官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下的“政治博弈”概略	(83)
当代南美其他政治体制概览	(86)
提议的分类	(89)
第三章 1966 年的阿根廷：一个官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发端	(92)
阿根廷历史遗产的某些方面	(94)
1966 年政变的社会背景	(106)
1966 年政变	(125)

第四章 一个不可能的“博弈”：1955—1966 年阿根廷的党派竞争 … (135)

背景 …………… (137)

模型 …………… (139)

历史事件 …………… (149)

一些实质性含义 …………… (157)

一些总结性评论 …………… (162)

后记：1979 年 …………… (165)

参考文献 …………… (171)

附：官僚威权主义国家中的紧张状态与民主问题 …………… (187)

(6) …………… (187)

(1) …………… 类代已易部 章一第

(1) …………… 类代已易部

(7) …………… 类代已易部；类代已易部

(13) …………… 类代已易部

(23) …………… 类代已易部

(27) …………… 类代已易部

(41) …………… 类代已易部 章二第

(44) …………… 类代已易部

(47) …………… 类代已易部

(57) …………… 类代已易部

(68) …………… 类代已易部

(68) …………… 类代已易部

(68) …………… 类代已易部

(89) …………… 类代已易部 章三第

(90) …………… 类代已易部

(101) …………… 类代已易部

(129) …………… 类代已易部

图表目录

- 表 1 以市场价格计算的南美国家人均 GNP: 1966 年 / 10
- 表 2 估计的南美国家间结构差异: 1965 年左右 / 20
- 表 3 南美国家农业和非农业地区生产率与收入比较: 1965 年左右 / 21
- 表 4 以市场价格计算的 GNP: 1966 年 / 28
- 表 5 南美国家的“城市”地区: 1960 年左右 / 30
- 表 6 南美国家“动态的”和“缓慢增长的”产业按美元计算的产出总值
($\times 1,000$)及其总价值百分比: 1960 年 / 31
- 表 7 南美国家的进口系数: 1963 年 / 32
- 表 8 按照用途对 1960 年南美国家工业产出构成的估计:
绝对数和百分比数据 / 33
- 表 9 南美国家产业工人和工会成员数量: 1960 年左右 / 34
- 表 10 南美国家的入学人数(千人): 1968 年左右 / 35
- 表 11 南美国家每年出版的书籍和译著数量: 1965 年左右 / 35
- 表 12 南美国家作为登记国在美国专利局注册的发明总数:
1951—1961 年 / 37
- 表 13 南美国家的电话装机数(1967 年)与日报发行量(1960 年) / 37
- 表 14 南美国家的交通数据(汽车): 1965 年左右 / 38
- 表 15 南美国家用以弥补国际收支赤字的补偿性国际融资以及
净货币储备的减少: 1946—1961 年 / 48
- 表 16 美国在南美国家的直接私人投资和直接私人工业投资:
1960 年左右 / 49
- 表 17 年度平均通货膨胀率: 1960—1965 年 / 50
- 表 18 南美国家工业(工厂)就业在整个非农业就业中的比例:
1945—1960 年 / 52
- 表 19 依照现代化水平对当代南美政治体制的分类 / 90
- 表 20 几项主要经济指标: 阿根廷, 1870—1914 年 / 99
- 表 21 几种关键经济指标的年度测量: 阿根廷, 1946—1966 年 / 109
- 表 22 阿根廷经济指数: 1925—1964 年 / 110

表 23	以每个部门的收入分享百分比表示的部门间收入变化： 1958—1965 年 / 112	表目表图
表 24	若干年份阿根廷家庭平均的真实收入 (以 1953 年数据为 100) / 113	表目表图
表 25	阿根廷和若干其他国家税收数据 / 115	表目表图
表 26	阿根廷直接税占政府总收入的百分比：1946—1964 年 / 116	表目表图
表 27	若干国家的认为全国性政府对他们日常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的 受访者百分比 / 121	表目表图
表 28	对问题“谁对政府有最大影响力?”的回答的百分比 / 121	表目表图
表 29	对关于阿根廷最重要的问题的提问之回答的百分比 / 122	表目表图
表 30	对问题“谁从伊利亚政府获益最多?”的回答的百分比 / 123	表目表图
表 31	对问题“你认为阿根廷的经济形势在接下来数月将改善、 维持原样或恶化?”的回答的百分比 / 123	表目表图
表 32	对关于政府绩效的问题的回答的百分比 / 124	表目表图
表 33	选举结果——宪政会议：1957 年(迪杭特比例代表制) / 150	表目表图
表 34	选举结果——总统选举：1958 年 / 150	表目表图
表 35	选举结果——州长与议会：1962 年 / 153	表目表图
表 36	选举结果——总统选举：1963 年(迪杭特体制) / 156	表目表图
图 1	三种具有相同均数的假设分布 / 15	表目表图
图 2	国家内部不同程度异质性的示意图 / 17	表目表图
图 3	对达尔关于政治体制产生模型的修改 / 70	表目表图
图 4	阿根廷政治意见(庇隆派对反庇隆派)分布 图示：1955—1966 年 / 138	表目表图